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 白痴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耿济之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耿济之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 F.)著;

耿济之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The Idiot

ISBN 978-7-5366-9036-3

I.白… II.①陀…②耿…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2377号

## 白痴

BAI CHI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耿济之译

---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谢仲伟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工作室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22.375 字数:620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我读《白痴》

李 锐

一本写于一百四十年前的大部头小说，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再版印刷，至今仍然被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阅读，不用说，它肯定是经典，因为有时间作证，因为有那么多反复的阅读作证。

但是，我的阅读经历告诉我，一个现代人要想进入一百四十年前的经典，还是要克服许多的障碍：比如，你必须得接受它从头到尾的“话剧腔”——所有的人物对白都一律是用舞台上的朗诵腔调进行的，甚至连人物的出现都是典型的剧场模式，都是在敲门声或者吵嚷声之后才登场。再比如，你必须得接受它近乎发热病式的爱情至上主义，或者说爱情原教旨主义——无论流氓恶棍、老奸巨猾、赤子圣徒还是无邪少女，只要一提到爱情，只要一接近爱情，理智全部崩溃，行为全部昏乱，那个占据了爱情中心位置的绝代美女，有近乎神迹般的魔力，让所有的人围着她打转，神魂颠倒、一掷千金、痛哭流涕、九死不悔。还比如，也是最为困难的，你必须得接受小说作者和他笔下所有人物毫无节制、随时随地的思想道德辩论会，更糟糕的是这些辩论无论观点多么水火不容、黑白对立，却都是一种对于人和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判断，都被归结为一种宗教立场的选择和背叛。等等，等等。

不用说，连我自己也问，那你还读它干什么？难道是你有病？难道你自己也是个“白痴”？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

一个现代人，一个坐在电脑桌前，靠点击鼠标联系世界、娱乐自己的现代人，到底能够从《白痴》这样的作品里得到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借人物之口，把自己身处的时代称作是“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而《白痴》就是对这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的灵魂审判。由于审判的严酷和锋利，由于审判的毫不妥协和直指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同代人称作是“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死于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久，人类依靠着铁路和罪恶打了两次最为血腥的世界大战，那种空前的血腥和残酷使得人们必须对“罪恶”重新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会想到，一百多年之后，作为现代科技和资本力量象征的铁路网，早已经被以光速运转的“国际信息网”所代替，如今的人们坐在恐怖主义和精确制导炸弹造成的废墟边上，在全球变暖的魔鬼气候中，进入了娱乐和网络的时代。之所以罪恶变成了娱乐，不是罪恶消失了，而是网络 and 现代视听技术把罪恶变成了“整点新闻”，变成了现代人早餐前或晚餐后娱乐的一部分。事实告诉我们，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判有多么残酷和天才，这审判对于人的罪恶甚至不能稍减半分。这会引出又一个难题：既然如此，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在我看来，上面这两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一切文学的考验和追问。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历久不衰地经受追问和考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白痴》的时代（1867—1868），正是俄罗斯传统的农奴制解体后，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巨变时代。那时候，“俄罗斯先进的文学界提出了创造正面人物形象的口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企图“解决创造文学中正面形象的任务”。《怎么办？》里真正的主角“拉赫美托夫是一位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他经过千锤百炼，决心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忍受一切考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用这个形象表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平民革命家的美好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他笔下的其他几个“新

一代的平常的正派人”不过是“简单、平常的房子而已”，他要塑造的是宫殿，“是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人”，“是要达到艺术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求”。为此，他的拉赫美托夫游历天下，助人为乐，“不喝一点酒，不接触女人”“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甚至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专门睡在用铁钉做成的针毡上，扎得自己满身是血。在普通人眼里那是一个“被一道灵光环绕着”的超人。尽管有沙皇审查官的百般查禁，在流放、监狱和绝食之中完成的《怎么办？》1863年发表之后立刻风行一时，成为俄国无数革命青年的教科书。据当事人回忆，列宁对这部书极为推崇，他宣称“它使我整个人生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变……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给自己侄女的信中说明《白痴》的构思，他写道：“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特别是现在。一切作家——不仅是我国的作家，就连所有的欧洲作家都算在内，只要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就总是会自认失败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个任务过大了。优秀人物是一个理想，可是，不论在我国，或是在文化发达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塑造出这个理想。”这样看来，用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文学创作，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新事物，原本就是老生常谈。理论家们总以为自己可以为文学指出一条光辉大道，总是希望把文学关在理论的围墙里边才放心。天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还是不能免俗，还是不能逃开时代思潮对自己的限定和影响，他在理性上希望自己能“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他原本也是打算把自己的小说关在理论和理性的围墙之内的。

《白痴》问世之后在引起轰动和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许多左翼的“进步”文学家、评论家纷纷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指责他以宗教的精神鸦片毒害人民，宣扬放弃反抗、放弃革命，宣扬忍耐和顺从。他们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无主义、自我矛盾的世界观，和他对于人的毫无信心的悲观立场。他们需要和欣赏的是拉赫美

托夫那样的“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革命领袖列宁的激烈批评：“对最拙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拙劣的模仿”，更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立场上清算了作家。

这么说来，追问和考验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时间是个好东西。时间除了能完成对人间万物无动于衷、概莫能外的淘汰之外，还能让一时一事的是非善恶变得无足轻重，让原本模糊不清、一文不值的东西大放异彩。

看过《怎么办？》之后，最强烈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只能充当资料了，起码不必再把它当做文学来阅读，它主题明确逻辑严密，像推演数学公式一样推演出爱情抉择和社会改革，推演出新人的神圣形象，并对一切难题都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和解决方案。读了《怎么办？》你就知道了“这样做”。作者的意图十分明确，一个给出了答案的“怎么办？”容不得“敏感的男读者”或女读者再多想什么。因为它一百多年前就把自己界限分明地关在理性和理论的围墙之内了。一本小说不再能进入人的感情，不再能引出人的联想，这本书就死了，最多具有资料价值，最多可以当做文物。可文学不是文字资料，文学是人类用文字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从这种本能出发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最为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可以历久不衰地进入人的情感和精神。当然，提到“本能”，立刻就可以弄出无数条“解构主义”的“颠覆性”的疑问来。比如立刻就可以发问：一个用文字记录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人，还有“本能”可言吗？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会有相同的本能吗？等等。限于篇幅我不能为此多费笔墨。但是，看看《白痴》或许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们已经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本意是要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来进行创作的，他一心想要完成的是连“文化发达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塑造出这个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尽全力塑造出他理想的“正面优秀人物”梅什金公爵。梅什金公爵由于患有癫痫病从小离开祖国，在瑞士一个封闭偏远的山村长大，这样的隔绝让他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孩童般的天真，

就像他自称的那样，“完全是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婴儿”。但是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真的孩子，却有着圣徒般的胸怀，他以不避利害、不求回报的怜悯心对待世界、对待一切人，甚至同样对待伤害自己的人。人人锱铢必较、梦寐以求的金钱，在他身上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像个散财童子一样把自己的卢布分给所有想得到的人。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想用自己的爱、用自己的献身搭救被男人们欺辱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那简直就是一场舍身饲虎的争夺。梅什金公爵唯一可以称作私心的，就是他对美丽忘我的追求。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对美一见钟情，家财万贯的时候他对美一往情深。可就是这样一位圣徒般的赤子，这样一个最优秀的“正面人物”，在这个羊狼贪婪的龌龊的世界上终于还是一事无成，他不但搭救不了任何一个别人，他甚至连自己也保护不了。小说的结局打破了作者本人原来的构思，以梅什金公爵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他最后的行为就是像傻子一样守在恋人的尸体旁酣然入睡。小说结尾的时候，梅什金公爵离开俄罗斯，又回到欧洲的疯人院成为彻底的白痴——一个只能回到疯人院的白痴的理想，只能是一场最为彻底的失败和幻灭。在这里，我们看到作家的创作激情和本能，让他最终冲破了理论的围墙。就像滔滔洪水只有冲破既定的河道，才能产生让人无比惊奇的意外，才会带来洋洋大观。也正因为如此，一百四十年后，当时的理论争端无人问津，《白痴》却被人世世代代反复阅读。

所谓苍天弄人，仿佛只是一转眼，在一百多年前的那些争论之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魂牵梦绕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世人面前轰然解体，那个允诺了要给予人们物质和精神最大自由、最大幸福的地上天国，那个坚信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个人和社会、人性和历史的终极目标之间，彻底完成了统一、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地上天国，一夜之间倒塌在地，摔碎成一片瓦砾。真不知这片触目惊心的瓦砾，又埋葬了多少失败、幻灭的“白痴”。让人感慨和悲哀的是，这一次历史的轮回，是让当初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坚信者



们变成了白痴。正所谓“只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我们看到，文学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超越了历史，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看到，正是从虚无、矛盾和无尽的怀疑中，生长出了理论难以概括的丰富；也正是从犹豫、恐惧和舍身忘我的悲悯中，生长出了深厚无比的人道情怀，让文学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历史是非和道德判断，也让文学超越了作家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里猛烈抨击金钱所带来的普遍的道德沦丧，态度之决绝几乎是在和历史作对，他宣称“现代的人全是冒险家……不择手段获得金钱”、“个个都充满贪婪的心肠，他们为金钱而神魂颠倒，好像发了疯一般！连一个婴儿都想去放印子钱”。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个“罪恶和铁路的时代”发出的抗议。他当然无法看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娱乐和网络时代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麻烦。他更不可能看到权力和金钱的双重专制，在中国制造出了什么样的现代人。在这样的双重专制下，人们被专制权力剥夺、压迫的痛苦和恐惧，又被金钱引导安置在消费和娱乐的幸福当中。于是，没有心肝的娱乐和消费就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欲望和时尚。你越是像一个精神侏儒，你越是毫无心肝得像一个白痴，你在这个时代就生活得越幸福。这是一个需要批量化大规模产生白痴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全球化的方式制造白痴，并且满足白痴消费幸福的时代。已经又有保守的右派理论家急着出来宣布，历史将终结在这个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第一部的结尾处，就把自己的故事推向了高潮。那位美艳夺魂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同时又是一个被富商包养的情妇，一个从小就饱尝了欺凌和损害的孤儿。在这个高潮中，那些贪婪而又各怀鬼胎的男人们，企图用金钱收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美丽，同时也收买她全部的尊严、幸福和命运。为此，利令智昏的富商阔少罗戈任，竟然拿出整整十万卢布，要从另一个男人的手中买下和纳斯塔霞·费里帕夫娜结婚的权利。在这场对于“美丽”的现场竞拍当中，忽然知道自己意外获得百万遗产的梅什金公爵宣称：“我想要

您是纯洁的女人”、“您同意嫁给我，我认为这是一种光荣。这就是您给我体面，而不是我给您体面。”梅什金公爵的求婚，是一个同时超越了金钱和美丽的非凡之举，是一个世俗的尺度无法衡量的道德行为。这样的行为，这样无条件的爱心，在那个像闹剧一样的拍卖会上，自然引出了人们无情的嘲笑，自然要被人们看做是一个白痴丧失理智的癫狂。正当人们为了金钱而发疯的时候，这部小说的女主角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当着所有人的面，准确地说是当着所有钱奴们的面，把整整十万卢布扔进熊熊的炉火当中。这个壮举让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变得像一尊悲愤的女神，她看穿了人间的虚伪和丑恶，毅然决定独自一人承担命运，跟随罗戈任而去。她用刻毒的嘲笑向所有体面的绅士们告别之后，却给梅什金公爵留下一句绝望的赞美：

“再见吧，公爵，我初次看到一个人！”

在我看来，无论是“罪恶和铁路的时代”，还是“娱乐和网络的时代”，人们都无法回避，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人”。不错，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罪恶。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所有的经典艺术，也从来没减少或阻止过哪怕一丝一毫的罪恶发生。可是，正是这些经典的存在，让人们知道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也正是这些经典在向人们证明着生命被剥夺、被扭曲的痛苦，在向人们证明着“一个人”本该享有的自由和幸福。

“经典”这两个字不是叫人跪下来膜拜的，也不是把人引向封闭和窒息的；“经典”是把人引向开放和生长，引向历史限定之外的无限可能的。

公元 2007 年 3 月 8 日写，10 日改定于草莽屋。

(注：以上关于《白痴》的引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白痴》，耿济之译。关于《怎么办？》的引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怎么办？》，蒋路译。)

## 英文版导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钟情也最具讽刺意味的词语，就是“现实”（俄文中的“现实”是 fakt，一个刺耳的外来语）。它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的流言飞语，但也只有通过这一点，读者才能理解《白痴》的内涵。作者本身生活中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现实”也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传奇：凶残的父亲被家奴谋杀（也许他的父亲并不凶残，也许这根本就不是谋杀），猥亵少女（这最终还是谣言，并没有得到证实），暂时性的大脑癫痫症，极度穷苦，四处逃债，因为煽动一场阴谋而被逮捕，以至于差点儿丢了性命，然后又遭到奴役刑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还有长达六年的赌徒生涯。这些事实已成为许多自传和精神分析的素材。其中弗洛伊德是最声名狼藉的，而约瑟夫·弗莱克是最理智全面的。

大部分事实收集在这本书的年表中，里面还掺杂了许多取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流传性很广的想象（卡拉马佐夫的死亡；《白痴》中梅什金公爵的发疯；《穷人》中杰武什金仅够糊口的生活；《死屋手记》和《赌徒》中刻画的地狱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式批判通过这些在他的小说中展现出来，虽然根基并不牢固，许多外国学者还是很快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科学批判主义”，其中最草率的论断无疑来自埃迈尔·海宁格：

最能够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创性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因素，就是他在理性与感性上极端的不平衡。他以半疯狂的逼真和诧异看待世间的人事。因为期望从来不会束缚他的行动，也不会让他为事件的前因后果找个合理的解释。

于是他用不羁的眼光看待奇特的事物，这也使他的感觉变得支离破碎。同样，无论是以叙事的方式还是人物刻画的方式，给领悟力不强的人持续灌输这些支离破碎的感受，都会使他们感到迷惑，反而会认为故事情节变幻无常，人物也捉摸不定……因此，一旦才能慢慢累加成天赋或才华，就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绝妙的人物特性。因此，总体说来，肉欲、野性、暴力、凶残、无知，这些都是他笔下潜在的、不拘小节的人物性格，更重视肉体而非精神。

这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特点最绝望的描述，看来似乎还有些道理。《白痴》的叙事者——在智力与理解力上绝不同于本书的作者——看来随着情节和人物的发展会经常感到迷惑。可以确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确实脾气暴躁，不讲道理，在这个文明社会是臭名远扬的“不拘小节”。约翰·兹埃迪和利奥尼德·提普斯金最近的小说就成功描述了作者的性格特征，比任何学者和心理学家作品都要成功。陀氏其实是个生活在心理崩溃边缘的人，金钱上一贫如洗，精神抑郁。据他自己的统计，从二十六岁起，大脑癫痫症就每三周发作一次。

尽管如此，有关他生活和工作上危言耸听的细节，还是有待考证的。詹姆斯·莱斯在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病态的全面而且深刻的文中指出，与《白痴》主人公不同，陀氏基本上还是可以预计到自己的病情的，并很少在公众场合发作。他可以控制赌瘾，并最终结束了对赌博的沉迷，他还还清了所有欠债。和陀氏同时代的俄国批评家都诽谤他性格中的疯狂、暴力和丧失理性，但他却得到了当代外国评论家的赞赏，这些特点大都是他少年时代读的那些 19 世纪欧洲作品的创造性延伸。这在一开始并没有被他的第一批欧洲读者所接受，于是他将浪漫主义风格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元素回归到作品中的主旨、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

20 世纪后期的学者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笔记和修订本——大部分收录在苏联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30 卷著作

中——后指出，他的作品建立在对文学艺术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和亨利·詹姆斯不同，陀氏在正文前从来不附带序言，也没有发表过有关诠释自己小说艺术特点的文章；而亨利·詹姆斯低估了除了屠格涅夫以外的所有俄国文学著作。笔记显示，对于叙述性的观点、原型、情节发展和风格（喜剧、悲剧、讽刺、嘲弄）如何选择，并到底会在修辞和审美上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二人的理解没有很大区别。尤其是洛宾·米勒对于《白痴》笔记的权威评论，向人们展开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认识的新的 一页。

这些关于他作品和写作过程的研究细节，都会让我们在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未被教化的人物时产生这样的第一印象：在各种意义上，都觉得他是个赌徒；但与他赌博这种投机性行为的沉迷相比，他更大程度上的赌博不是持续了六年的俄罗斯轮盘，而是将近四十年的写作。写作支撑住他的整个生命，也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年代。世俗意义上的俄国文学仅仅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早诞生一个世纪。向真正权威的文学迈出试验性的第一步并不是从作者那个充斥着沙龙聚会和宫廷权利的时代开始的，而是比他早一个世纪的那些人：诺维托弗（1744—1818），卡拉姆津（1766—1826），普希金（1799—1837），果戈理（1809—1852）和莱蒙托夫（1814—1841）。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情况远不止延续文学发展道路这么简单。首先，用亚历山大二世的话说，当时的独裁政府已无法处理“不可操控且无节制的印刷品”。1750年到1854年这段时间，私人印刷品经历了从合法出版到禁止再到解禁的波折。人们歧视那种模糊不清的暧昧话语，然后这一特点的文章段落，事实上是作者，遭到唾弃。进口的外国书籍也是一样，颁布禁令，然后解禁，以至于进口书数量骤减。审查部门的权利被无限扩大，有时还会自相矛盾。皇家政府也对颁布过的法律不够尊重，甚至有个审查员抱怨说“俄国没有法律”。随着俄国在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中战败和1855年新沙皇的上台，社会状

况改善了一些，但与理想状态还相差甚远。在 1863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兄弟成功地创办了一本叫《时代》的杂志，但由于后来杂志发表了一篇无伤大雅的关于波兰起义的文章而被迫停刊。那时他就感到了自己背负的压力。那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热血方刚的爱国青年，那个在自己小说中没有表达对波兰人一丝怜悯的人物，按理说已经可以忍受那个一直以来反复无常的政府了。这个禁止《时代》杂志出版的政府，居然可以允许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乌托邦式的小说《怎么办？》出版发行，这本小说后来被包括列宁在内的激进青年认做福音书。

通往成功职业作家的道路上有太多阻碍，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不敢冒险跨越这些。一份由 S. S. 夏什科夫所做的当代调查问卷显示，只有极少数作家能一年赚到两千卢布，而这点儿钱只够维持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花销；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持续四十年的状况终于有了一点儿好转。事实上，即使最出色的作家也会涉足商界或政界。托尔斯泰继承了一大笔房产（大约有八百个家奴），屠格涅夫与其兄弟平分了大量的家产。这些显赫的家世都反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负债累累的悲惨境地。冈察洛夫和萨尔特科夫都来自贵族家庭，生活富庶，在政府机关的事业也一帆风顺。与他们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工作没多久就辞职了。陀氏的家庭背景十分普通——母亲家里是做地产生意的，父亲从一个清苦的教区牧师慢慢奋斗到贵族社会的下层阶层。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自己的军人生涯后，把父亲微薄的房产拿去做抵押，换来一千卢布。此后，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来源，只能靠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维持生活。

那时，作家指望找到固定读者群的艰难程度无异于反抗俄国法律系统。开始创作《白痴》的前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估计大约每五百个俄国人中才有一个受过教育，他们基本上能欣赏文学作品。那时，他和他的同伴们就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报纸和个人刊物上发表大量的文章作品。在他流放西伯利亚的八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与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待在一起。这使他的

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动荡，让他认识到宫廷中那些接受西方思想的极小部分精英和一直保有传统俄国东正教思想的文盲民众之间的文化分裂是多么巨大。他开始探索这种文化分裂，也开始学习容忍他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把自己流放生涯的后半部分全都用来想办法化解两方的矛盾，试图通过 *pochvennichestvo*（俄语中的土壤）政策让俄国的亲西方派和亲斯拉夫派和解；关于这一点，他在《时代》杂志中阐述过。但他都是以一个职业作家的身份去处理这些事情，而不是一个宣传家或辩论家；并且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更清楚自己除了要和文化精英们辩论外，还要懂得如何娱乐大众，抓住大家的眼球和想象力。

以那个时代的标准衡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金钱上确实不充裕，但他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却十分丰富。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都使他产生了对文学的热爱。在皇家军事工程学院期间，他学习过法国和俄国文学、德语还有历史等方面的课程。无论在家中、学校，还是后来去了圣彼得堡，他都一直思考并执迷于与他人讨论《圣经》；《约伯记》、《启示录》和福音书，尤其是《约翰福音》，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与那些崇洋媚外的精英阶层不同，他的家庭一直教育他要尊崇俄国文学，他的作品——包括《白痴》——都能折射出普希金、果戈理和卡拉姆津的思想。果戈理对他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点从他处理小说中各种角色和多人称叙述之间的离奇关系中一览无遗。这些人物都生活在那座空想城市——圣彼得堡中。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作品将圣彼得堡塑造成一座极端之城，里面充满了灭绝人性的毁灭和突如其来的改变。陀氏非常重视现实，在完成《白痴》后，他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幻想的”，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受了那两位前辈对这座官僚主义俄国首都描述的影响。就如他笔下的一个“地下人”曾说过的“这是地球上最抽象，也最国际化的城市”。之前的文学巨匠们没有将幻想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而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到了。他在这本小说的开篇便很快把这方面体现了出来：火车站作为故事的背景地，主要人物也是个刚回到家的公爵。

纳博科夫就嘲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式爱国主义，还情不自禁地称他为“最欧洲化的俄国作家”。陀氏早期的信件和后期的杂文对自己的小说只字不提，却流露出对那些由俄国翻译家和文学杂志介绍到国内的几个相互关联的文学流派强烈而又持久地喜爱。德国作家席勒的作品让他觉得生命就是一场盛宴，这种心醉神迷的感觉使他认为人类应不断追求完美。人们会通过精神、情感等方面的交流而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变得像真正的兄弟姐妹一样。这种想象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延续到《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身上，然后又出现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诗文间的忏悔和阿辽沙·卡拉马佐夫最后的演讲中。他少年时的另一钟爱，就是哥特式的小说，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神秘的背景地，被精神障碍困扰的人物和神旨性的暴力情节。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哥特”，而不是现在这种蔑视性的角度，我们会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的作品都是围绕敢于挑战道德和神权这一中心思想的。法国的社会浪漫主义（乔治·桑、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乌托邦社会学家）对他也影响深远。在阅读他们书籍的过程中，陀氏学会了批判当代社会，梦想将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变成一种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开始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崇的典范，包括莎士比亚，都被他所引用，并构成他以后作品的情节框架。所以，从文学的另一角度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浸于为受欢迎的报纸撰写专栏和连载小说。大致看一下他现存选集上的那些注释就能发现，他少年时代博览群书对他后来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小仲马的《茶花女》，里面的女主人公与《白痴》中受尽磨难的非利波夫娜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些广泛的素材根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他对于职业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也终于有了回报。他的第一本小说《穷人》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也为他流放之前的小说创作赢得了稳固的赞誉。包括大众读者在内的少数人对他从政治监禁和流放后的回归（1859）给予了热烈欢迎。他在1860年出版了两卷他前



流放时期的小说选集，那个时候很少有人选择这样的出版方式。许多成功的文学商业运作都是凭借出版所谓的“大部头”作品——因为不论是大众读者的阅读广度还是书籍的发行网络都不能有效地使个人选集有很大盈利。但他的杂志《时代》和伪监狱回忆录《死屋手记》都让他这一年的收入剧增，达到 8000 到 10000 卢布。

尽管如此，《时代》杂志的结束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一系列灾难的导火索，这些也逼迫他完成了《白痴》的创作。他侄女、妻子和兄弟密克海尔的先后去世（1864 年 2 月，1864 年 4 月，1864 年 7 月）都是家庭不幸和沉痛打击，也对他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影响。他兄弟去世之前，获许出版的名为《新纪元》的杂志，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创刊时期。整整一年，每期杂志都会推迟两个月才能面世。因为《时代》停刊后，余下的杂志没办法再发行，所以要给那些订阅了全年《时代》杂志的读者很多赔偿，所以他的收入也开始减少。更糟糕的是，这本新杂志上刊登的小说并没有达到以前那本杂志的水准。唯一的例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著作《地下屋手记》，这本书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和 20 世纪最受人尊敬的小说之一。到了 1864 年，情况有了变化，中篇小说开始挑战连载小说的地位：连载小说第一和第二部分间有长达两个月之久的间隔，这使读者无法理解两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批评家也以沉默来贬低连载小说。

同时，密克海尔的遗孀还有年幼的孩子，已欠下 33000 卢布的外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责任承担照顾他们的义务。为了养活自己、他的继子和他兄弟的家庭，他做了两个很冒险的商业投资决定。第一个是继续经营《新纪元》，而不是之前打算的将它作为流动资产抵给他兄弟的债权人。但由于订阅者人数不够，这个决策彻底失败。这也迫使他做出第二个决定，同意在 1866 年内完成两本小说的写作，这是特罗洛普的创作率，这样的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之后的职业生涯中都没再出现过。其中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后来的《罪与罚》，被收在了卡特科夫的“大部头”作品《俄国信使》中，报酬是 150 卢布一个署名